

【後記】

民主轉型的回顧與前瞻

劉述先

一九八二年七月底《中國時報》邀請學者在宜蘭棲蘭山莊開會，主題討論「近代中國的變遷與發展：人文及社會科學的探索」。那幾日正好遇上颱風，對外交通一度斷絕，白天專心一志開會，晚上沒電，點上蠟燭，繼續嚴肅問題的討論。這樣的經驗畢生難再，回想當時情景，好像就在眼前，轉瞬二十年過去，卻是記憶猶新。記得有一晚我和一群年輕人在一起，那時還在所謂的威權體制統治之下。在黯淡的燭光下，我卻忍不住大放厥辭，講了一些他們聞所未聞之事。我先提了一個修辭式的問題，問他們知不知道，為什麼我們會丟掉大陸，退到台灣來？他們熱切地期盼著我的答覆。我說原因在於國府在大陸實行的不是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，而是「二民主義」。當然他們從來沒有聽過這種奇譚怪論。原來當時的國府聽任豪門肆虐，搜刮「民」脂「民」膏，以致徹底喪失「民」心。民國三十八年時的青年學子，連中學生都在倡言革命，國府除了一敗塗地，還有別的可能嗎？我也正是因此被逼得走上了哲學的道路，因為

我堅持在訴之於激進的實際行動之前，先要明白什麼是國家民族文化應走的方向，要怎樣才能在這樣的亂世中體證自己生命的意義，而不可以人云亦云，被人牽著鼻子走。我一生做抽象的哲學思考，正是爲了要回答個體的安心立命，與國家民族、社會文化、政治經濟發展的方向，這一類與自己休戚相關的實際的大問題。

在會議中我提出的論文是：〈從民本到民主——爲陶百川先生八十壽慶而作〉。我對陶先生僅有一面之緣，絕無深知。但在我的印象之中，數十年來念茲在茲，他所關心的只是國家民族自由民主法治的前途，爲人權得到充分的保障而奮鬥，故不能不對他表示最高的敬意。但在當時已有人懷疑他言行的動機，警總甚至有一批人乃認爲他「其心可誅」、「罪無可追」。如今威權體制結束，阿扁總統當選，政黨輪替民主轉型成功。陶先生對台灣走上民主道路的功績人所共知，卻與實際利益的分霑沒有半點關係，尤其令人感佩。如今又值陶先生百歲壽慶，《中國時報》余範英小姐邀約我們寫篇文章重新檢討當時的思緒，就我來說，當然是義不容辭，這便是我寫這篇短文的緣起。

這二十年來的發展幾乎完全印證了我文章裡的說法。全文分爲兩個部分：前半是歷史的回敘，後半論未來的開展。在回敘傳統方面，我作了一個重要的區分，也就是說，我明白斷言，我們過去只有「民本」的傳統，絕沒有西方式的「民主」的傳統。這樣就可以避免許多由於魚目混珠而引起的不必要的論辯。一句話，我們是孟子「民」

貴「君」輕的傳統。儒家所嚮往的是，「人君爲人民服務」的理想，這是一種 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（民享的政府），但決不是「民治」（by the people）、「民有」（of the people）的政府。孟子的思想不論多麼開放，仍然清楚明白地肯定了上下尊卑的秩序。他所不能忍受的是楊墨無父無君的思想。他要的是聖君賢相爲人民謀福利的「君主制」（monarchy），決不是西方的「民主制」（democracy），無論是希臘雅典直議的方式，或者近代英美代議的方式。所謂「選賢與能」也決不可以誤解爲投票選舉的制度，而是堯選拔了舜，舜選拔了禹來掌管天下事務的措施。只不過歷史的偶然讓禹傳位給啓，而下開了家天下的規模。但先秦儒者如孟子心目中嚮往的，還是堯舜的禪讓，並不是三代的世襲。然而漢代建立了大一統的帝國，確立了尊君卑臣的制度，雖然好的君主憂慮天變、民變，並不敢胡作非爲。而考試制度的建立，形成了君、仕、民的三層架構，自有其內部的均衡，從無一日真正實行過政教合一的構想。而皇帝太壞，秩序崩潰，那就不免改朝換代，一直到滿清遜位，民國替興，這樣的「超穩定結構」才終於告一段落。而明清專制，每下愈沉，很明白的是「主權」（sovereignty）確定在「君」，決不在「民」。受到進步的近代西方文明的衝擊，晚清知識分子爲了救亡圖存，莫不勇於衝決網羅，變法圖強，最後終於導致帝制的崩潰。而五四運動標舉出德先生、賽先生的旗幟，爲未來的開展指出了一個大方向。轉眼八十年過去，民主轉型仍不能完成，個中癥結何在？正需要我們仔細考量。

史家余英時指出，清代的洋務派莫不對科學與民主取開放與贊許的態度。這表示中國文化傳統雖未發展出這二方面的成就，卻有內在的資源促成文化的轉化。不幸的是，國難方殷，不免有亡國滅種的危險，於是激進主義當道，所謂「救亡壓倒啓蒙」。神州陸沉，毛澤東真正做到了政教合一，卻造成了文革的巨大災禍。所幸四人幫倒台，鄧小平取開放政策，情況大為改善，卻又不幸發生天安門事件的頓挫。如今在軍事上大陸是個擁有核武的強國，但在四個堅持之下，政權牢牢地掌控在共產黨手裡。近時大陸與台灣同時加入世貿組織，經濟上要進一步開放，外資湧入，造成一個新的變局。民主改革則遙遙無期，應該不是我們這一代人可見的未來了。

而在馬列毛思之外的兩個思想潮流，西方的自由主義與現代新儒學，則被流放到港台與海外，忍受花果飄零之苦。在國際情勢的改變之下，經歷了韓戰、越戰，海峽兩岸形成一長期對峙的局面。在思想上，全盤西化之論，既不可能，也不可欲。而且正如信奉自由主義的林毓生所指出的，反傳統主義者常常不自覺地受到傳統心習的宰制，故只有寄望於「創造的轉化」。反過來，現代新儒學雖常被劃歸保守主義的陣營，其實莫不堅信，必須站在本土的基礎上，吸收西方的科學與民主，以造成自我的擴大。而儒家也沒有像李文遜（Joseph Levenson）在六十年代尾所預料的，變成只有在博物館裡才能找到的東西。七十年代亞洲經濟起飛，日本與四小龍造成的經濟奇蹟，讓全世界對儒家傳統在民間的活力刮目相看。《時代周刊》（一九九三·六·十

四）乃以孔子爲封面，引述日裔美人福山（Francis Fukuyama）的說法，認爲自蘇聯解體以後，能夠向西方自由民主的意理提出挑戰的，不是伊斯蘭的原教旨主義，而是東亞式柔性的威權主義，像新加坡那樣，正是他心目中東亞模式的代表。

但在中西交流的過程中，我們不必因受到貶抑而沮喪，也不必因得到贊許而色喜。福山著《歷史之終結》，一向認定歷史發展到西方的民主，已經到了至善的地步，落後國家一時還接不上西方的民主，故還不如先走東方柔性的威權主義的道路。而台灣由威權體制到民主的轉型也並非一帆風順，一樣出現問題，正如我在二十年前所說的，會經歷到有如脫胎換骨那樣的困難。我一貫認爲傳統的資源與負擔一根而發，不能單純只由正面或者負面立論。國府遷台之初適當危急存亡之際，在老蔣總統治下採取威權體制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而政府銳意推行二七五減租，建立財經內閣，爲七十年代的經濟起飛打下了基礎，這是不容加以抹殺的史實。當然在這一段時間之內壓抑黨外的發展，炮製了雷震的冤獄，也確留下了一些黑暗的污點。到小蔣總統繼位，刻意提拔本地人才，當然中間也曾經歷美麗島事件的頓挫，但終究他明白歷史的趨勢不可違逆，決定不再傳子。此後台灣人出頭天，由李登輝而陳水扁，完成了政黨輪替的歷史使命，不能不說是一項超特的成就。然而令人遺憾的是，迄今爲止，成就的只不過是選舉投票的形式民主，並沒有學到西方民主的神髓。這由兩方面的比較立刻可以看得出來。民主的難處在，一方面是一個開放自由多元的社會，另一方面

又凝聚了高度的共識。就美國來說，由對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的回應就可以看到全民的向心力。而民主的施行必須有杜威所謂民主的心態配套才行，這恰恰正好是我們最缺乏的東西。如果美國真的只是好萊塢電影讓我們看到的美國，充滿了暴力、性、藥物、個人享樂主義，再富強的美國到時也會像羅馬一樣衰亡。事實上美國不只幅員遼闊，有豐富的自然資源，有勤奮的工作倫理，還有愛人的宗教情懷。而民主政治的運作要靠理性的思維與妥協的技巧，政府架構之立法、司法、行政三元分立加上民主、共和兩黨的對立，卻還能夠運用自如，就是依賴這樣的奧秘。反觀阿扁上台，受到台獨與反核意理的牽制，明明是少數政府，卻偏要強勢運作。結果是兩岸關係倒退，核四停建，剛好碰上世界經濟不景氣，股市崩盤，再加上地震天災，大家日子難過。卻又爲了爭取選票，不惜挑動族群間的矛盾。政策東搖西擺，口是心非，根本不能建立誠信。結果大家口頭上在拚經濟，實際上在拚政治，立院的肢體、語言暴力都是負面的示範。民調青年人對前途全無信心，再不改弦更張，只是在口頭上呼籲人民要有信心，那就只能更加彰顯出信心危機，不免教人憂心忡忡。本來李遠哲等清流登高一呼，促成政黨輪替，不願看到黑金污染，繼續沉淪下去，這樣的想法自無可厚非。但令人感嘆的是，如今黑金污染不止，社會風氣進一步敗壞下去。每日報導的是璩美鳳一類的醜聞，而樂透上市，全民皆賭。這樣是在走精神上升的道路嗎？二十年前我在文章中指出，民主不是萬靈藥，必須政教分離，兩隻腳走路才行。弔詭的是，七十年

代報禁未開，民眾普遍關注兩大報刊登的知識份子的讜論。如今大家只講享樂，傳播八卦新聞，看政治秀，知識份子更邊緣化，這就是我們所嚮往的開放社會嗎？當然我並不知道要怎樣才能解決問題，也並不完全悲觀絕望。我只是要利用這個機會講一些不合時宜的話，把問題拋出來，讓大家想一想。每個人由自己做起，不隨波逐流，先做出一些小小的改變，或許就是未來希望之所繫罷！總之一句話，我們走的大方向是對的，但還有遙遠的路要走，尚盼大家努力好自爲之。